

暴风雨一定会来临

——评苏修《团报》关于中学文学课的一场争吵

施 外 雨

学生问“为什么”，教师回答“为什么”，本是学校中的常见现象，其实也不尽然。

被苏修捧为中国古代“全民教育家”的孔老二，自命“诲人不倦”。学生问奴隶制的“诗”、“书”、“礼”、“乐”时，他唾沫横飞，对答如流；但是樊迟问到怎样“学稼”、“学圃”时，就遭到他一顿臭骂。可见，在奴隶社会的学校中，是不能随便问个“为什么”的。无独有偶。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谓予不信，且举一例。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苏修《共青团真理报》在《为什么》的总标题下刊登了十年级女学生塔吉亚娜的一封信。这封信批评苏修中学文学课讲授某些古典作品，质问为什么把这些“漆黑一团的东西”塞进教科书，为什么把那些“居心不良”、“简直是畜牲”的“卑鄙之徒”强加给学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打算谋财害命吗？”

这么一个年青女学生的质问，却惊动了苏修老爷们。他们惊恐万状，如临大敌，剑拔弩张地进行“围剿”。一个名叫鲁坚科的“评论员”，在同一天同一报同一《为什么》的总标题下抛出署名文章，吹捧封、资、修的东西“感情细腻”，跨越了“时代的范围”，具有“表现力”、“感染力”，说什么讲授这些作品“得到法律规定”；同时这位“评论员”先生摆出一副老爷架势，气势汹汹地给提“为什么”的青年学生扣上种种帽子，什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一代人的自私”等等，等等，张牙舞爪，凶相毕露。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为攻击靶子而发表的塔吉亚娜的信在全国得到了热烈反响，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报先后收到了近五千封读者来信，许多人同情和支持塔吉亚娜的观点，认为塔信是

“非常典型的”。这些信进一步揭露了苏修腐朽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反映了苏联人民对苏修教育制度和现实生活的不满。有人甚至喊出：“多么希望来一场暴风雨！”苏修当局见势不妙，使了个“金蝉脱壳”计，急忙刊登启事：“停止刊登来信”，诡称将把收到的信“转给教育部门”，妄图一推了事。

我们不禁要问：苏修当局“为什么”对这么个小小的女中学生大动干戈、兴师问罪呢？

原来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早在一九六八年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上就曾经警告教师们，当学生“提出许多‘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时，“应该关心地、有分寸地加以扶持，使其用在有益的事业上。”这里又是“关心”，又是“扶持”和“有益”，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要把青年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不许他们“犯上作乱”。对于主子这一席话，这位蹩脚的“评论员”先生心领神会，不过比她的主子说得更露骨罢了。她在文章中说，塔吉亚娜的信使她感到“寒心”，“‘为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以前的一切都抛弃了。”并以威胁的口吻说：“但愿塔尼亚这封信本身能成为一个教训。”

呵，原来如此。问题明白了。一个小人物提出的“为什么”，可以把“以前的一切都抛弃”，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不是会引起一场“暴风雨”，把现在的“一切”也“都抛弃”么？苏修老爷们岂止是“寒心”，简直是胆战心惊。太可怕了，应该引为“一个教训”，于是演出了一场“杀鸡吓猴”的把戏。

“鸡”杀了没有，“猴”吓着没有，暂且不论。当然，对于当今世上一霸来说，杀几只“鸡”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可是要阻止“一场暴风雨”，那是回天无力的。

问题发生在教育部门，而根子却在苏修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一个学校，开什么课，讲什么内容，用什么思想教育青年，都有一个路线问题。苏修明文规定，在八至十年级，要学习俄国文学的系统课程，主要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系统课程。什么叫“系统课程”？就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系统”地“在新的旗帜下偷运旧的垃圾”，要青年一代倾倒在古人、死人、洋人面前，顶礼膜拜，俯首贴耳地顺从苏修老爷们的统治。不这样，就叫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一代人的自私”。他们就这样用法律加大棒的方式，向青年强迫倾销描写凶杀、色情、忏悔、死亡……的“古典作品”，使封、资、修毒素成为“公害”，泛滥成灾。用塔吉亚娜的话来说，这一切“没有一点光明，好象一切都是在臭水坑里发生的。”“臭水坑”，多么恰当的字眼！今日的苏修社会不正是一个大“臭水坑”吗？他

们的学校不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这里面蛆虫蠢动，孳孳滋生，臭气熏天，毒人害人。在这“臭水坑”里，塔吉亚娜“所不愿看到的”是课堂上的“一切”，而苏修先生们害怕的是社会上的“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被抛弃掉。

至于他们的教学方法，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老一套看家本领，是为他们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服务的。且看，有一位匿名为N·C的学生在给苏修《团报》的信中透露了一点情况：“我们这里一开始就……对‘成绩好的’学生‘袭击’。必须在五分钟内说出一切——从作品内容到对人物及其行为的评价。”“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神色是多么痛苦啊！”一个家长在信中抱怨孩子们“上文学课就象服苦役一样”。这不禁使人想起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所描绘的德国爱北斐特实科学校的情况：“这个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这种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苏修老爷们就是用满堂灌、死记硬背、突然袭击等方法，扼杀青年的革命精神，把青年培养成唯唯诺诺、浑浑噩噩的“傻瓜”和驯服工具。

当然，苏修叛徒集团不仅需要训练出大量的“傻瓜”和“工具”，正如塔吉亚娜信中所说的，还需要“居心不良”的“卑鄙之徒”。君不见，一小撮特权阶层分子利用掌握的财富和权势，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女沿着所谓“全民教育”的阶梯，爬上“宝塔尖”，然后为官作宦，青云直上，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就彰明昭著地说过，“国家主要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他们甚至连一块遮羞布也不要，赤裸裸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为了在历史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级。”真是妙不可言的自供状。就这样，从法律上、理论上把特权阶层子女的权力、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固定了下来。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过为了适应现代机器生产的需要，接受一点专门训练，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财富罢了。所以，苏修需要的不仅是少数骑在人民头上的“当代英雄”，也需要更多的“傻瓜”，不仅要有吃人的魔鬼，也需要更多的绵羊，不仅精心培育奴才的主子，还要训练大量主子的奴才。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一叶落而知秋。从苏修中学文学课的这场争吵中，我们看到苏修教育日益反动、没落和腐朽极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了苏修的政治、经济危机四伏，日暮途穷。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又是诡辩，又是恫吓，也压不住苏联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山雨欲来风满楼”。受到列宁、斯大林教育的苏联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一定会用革命的暴风雨扫荡一切“黑色的”“臭水坑”，并在填平的“臭水坑”上重建一座辉煌的社会主义大厦。